

文苑笔谈

风雨城中李二三春戴荠菜花

梁永刚

春日麦田散发着清冽气息,返青的麦苗和诸多伴生野菜,争着抢着往上蹿,葳蕤成一地生命的绿色。这方如茵舞台上,最先亮相的野菜便是十字花科芥菜属的荠菜。荠菜俗称“荠荠菜”,查词运用在野菜名字上,是一种亲昵,也是一种喜爱,就像父母常把“妞妞”“宝宝”唤作儿女的小名一样。我所喜欢的宋代词人辛弃疾,曾这样吟咏荠菜这个野生之蔬:“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每次读到这两句,都能感受到不同的人生态况味,真不愧是经典之作。

荠菜是先春而萌、返青最早的报春菜,也是早春第一个走进乡民食谱的野菜,开春便可食用,叶嫩根肥,入口味甘,有一种独特的清香之气。早春萌发的荠菜容易老,远不如其他一些野菜可以采食一个春天,甚至一个夏天。旧时乡间,家家户户粮食都不宽裕,荠菜是大地赠予贫苦乡民的一份厚礼,用荠菜调配寡淡无味的生活,是一辈辈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也是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举。古书上说,荠菜在灾荒年月是代粮充饥之物,贫穷之人视其为宝。有民谚为证:“荠菜儿,年年有,采之一二遭八九。今年才出土眼中,饥饿之人不停手。”

其实,荠菜作为乡野食材、平民野菜,充饥果腹只是其特性之一,若经一双妙手精心烹饪,也可成就一道珍馐美味。清人薛启辰所著《素食说略》说:“荠菜为野蔬上品,煮粥作齋,特为清永。以油炒之颇清腴,再加水煨尤佳。”

荠菜是地道的本土蔬菜,在我国生长了至少2000多年,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时期,《诗经》为证。《诗经·邶风·谷风》说:“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这是古人对荠菜的最初认识。到了汉代,辞书之祖《尔雅》中又有“荠味甘。人取其叶作菹(腌菜)及羹(菜汤)亦佳”的记载,可谓是荠菜入馔的最早文字记录。直到北魏末年,中国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中正式将荠菜列为蔬菜作物。到了唐宋时期,民间吃荠菜之风流行,甚至成为一种习俗,正所谓“春日春盘生细菜”“盘装荠菜迎春饼”。每年立春,无论贫富,各家都要吃以荠菜为馅的“春饼”,或者以荠菜与其他食材配制的菜肴“春盘”。不仅自家吃,还要把自家做的春盘、春饼作为礼品馈赠给亲戚友人,寓意辞旧迎新,由此可见荠菜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想要见识荠菜的清新朴实接地气,那就先看看其在民间的一些别称吧,譬如,地菜、野荠、护生草、鸡心菜、净肠草、地米菜、枕头草、清明草、菱角菜。每一个温婉朴素的别称后面,都弥漫着人世间的烟火气息,只需轻轻念读出来,便有清纯之气扑面而来。以菱角菜一名为例,陆生的荠菜和水生的菱角,本来在地域空间上相距甚远,只因铺展开来,有着几分相似,即都自一个中心点向四周辐射,于是荠菜便多了一个菱角菜的别称。再来看看荠菜的身姿长相,叶子有绒毛,呈羽状分裂,小花为白色,属总状花序,果实是角果,种子娇小玲珑,就像一位清丽可人的邻家女孩,让人看上一眼,不由得心生怜爱。

幼时在乡间生活,我不爱吃葱姜蒜之类的菜蔬,总觉得有一股子怪怪的味道,嗅之反胃,令人作呕。但是,对荠菜的味道我从未排斥过,那种清新淡雅,那抹浅浅的暗香,让吃饭再挑剔的人也难以抗拒。荠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和其他蔬菜搭配,或清炒或烩菜,或制馅或煲汤,可谓是一菜多用,百味生,总能起到淡者出味、浓者提鲜的奇妙效果。就像一个包容大度的人,和谁在一起,都能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在我幼时,春日放学后,常常挎着篮子去地里割荠菜,回家后,择去杂草,洗去尘土,被母亲作为各类面食的搭配之物,譬如,荠菜包子、荠菜饺子、荠菜卷煎,皆清香耐嚼,鲜嫩可口。

荠菜虽是稀松平常的乡间野菜,却因颜色绿、口感好、味道美,被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所喜爱。白居易在《春风》一诗中写道:“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开。荠花榆荚深村里,亦道春风为我来。”寥寥几句,把其貌不扬的荠菜与梅花、桃花相媲美,可见诗人对荠菜是何等的喜爱。范仲淹少年时家境贫寒,常以荠菜充饥度日,因此他对荠菜有着深厚的感情,特地写下了《荠赋》:“陶家瓮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大口,嚼出宦商角微。”陆游对荠菜也是赞不绝口,在他心目中荠菜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大鱼大肉:“长鱼大肉何由荐,冻荠此际值千金。”郑板桥曾写过一首关于荠菜的题画诗:“三春荠菜犹有味,九熟樱桃最有名。清兴不辜诸酒伴,令人忘却异乡情。”

古代文人喜欢荠菜,现代也有不少文人爱吃这一口儿,周作人在他的散文《故乡的野菜》中对荠菜有一段深情的描述: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劳作游戏。那时小孩们唱着:“荠菜马兰头,姊妹嫁在后门头。”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

《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荠菜,桃李羞繁华。”《清嘉录》亦云:“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谓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上,以厌虫蚁。侵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号亮眼花。”

生长于荒野中的荠菜的人文轶事,真是怎么说都说不完。

书评

《白鹿原》:礼法治理下的社会百态

孙全喜

鲁迅先生说,一部《红楼梦》,“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陈忠实50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我见的是礼法治理文化下的乡土中国。

宗族与礼法奠定了白鹿村的治理基础,儒家文化塑造了《白鹿原》的精神内核。祠堂作为最重要的权力和精神场域,《乡约》作为最重要的礼法治理象征,草蛇灰线,成为贯穿整个《白鹿原》的丝线。

1. 《白鹿原》开篇即开启了黄土生生不息的生命画卷,描写了关东陇原古老村落在小农经济最后一抹夕阳余晖映照下的风景。

德高望重、礼仪化身的朱先生起草了“一个过日子的章法”——《乡约》。《乡约》主要内容体现在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包括“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修其家”“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等内容。为此,族长白嘉轩郑重向村民宣布:“学为用,学了就要用,说话走路处世为人就要按《乡约》上说的做。”凡是违犯《乡约》,犯过三回者,按其情节轻重处罚。由此,“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犷的背诵《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断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被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事都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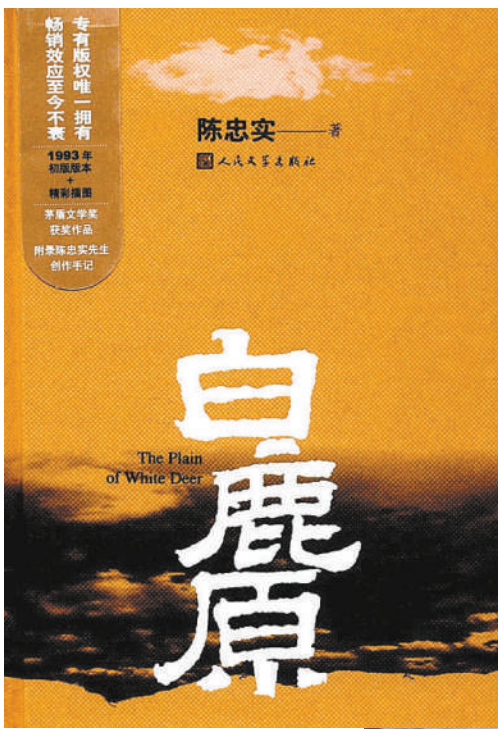
祠堂作为白鹿原的精神家园,体现了认祖归宗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但有犯过错,则对祠堂列祖列宗,跪背《乡约》,罚款,罚粮,鞭抽板打。白嘉轩还发明了赌钱治手、抽大烟治嘴的惩罚方式,让赌钱者将手放入刚烧滚的开水中,给抽大烟者口中抹上屎尿……

白嘉轩翻修宗祠,补续族谱,一句“凡是白鹿原上的人,迟早都要跪到祠堂里头”俨然成了精神箴语。然而,由于越强调越出问题的“反向效应”,黑娃做长工与主人的小妾田小娥有染,这种不道德行为被禁止进入祠堂拜祖。黑娃在年初一砸毁祠堂,既是对白嘉轩气宇轩昂的挑战,更是其拜祖不成的过激宣泄,那打在白嘉轩腰上的一闷棍,更是对传统礼法的狠命一击。然而,劫后余生,他最终仍然对着白嘉轩向隅的身,扑通跪下,手颤脚抖,“在香炉刚插入香炉”时,就跪倒在祠堂里,声泪俱下,应了白嘉轩的那句人人都得跪祠堂的话。连朱先生也慨叹:“想不到我的弟子中真求学问的竟是个土匪胚子!”

恶莫大于耻,祸莫大于言。黑娃父亲鹿三手刃儿媳田小娥,杀死的也是对礼法道德的“耻辱”。当上了保障所乡约的鹿子霖,也耻于子孙不肖,向往的也是中了举人,在太爷坟前放三声铳,光宗耀祖。鹿子霖利用田小娥引诱族长白嘉轩长子白孝文,白嘉轩颜面丢尽,将白孝文刺刺抽打,赶出白鹿原。当白孝文酸溜溜地对田小娥说“他们在祠堂拜祖,就剩下我们俩天不收地不管的”,仍是向往祖宗的认可、精神的归属。白孝文心中对祠堂还存在圣洁的膜拜,又因为被刺抽打、逐出祠堂、借粮卖地、沿街乞讨,失去了心中那仅存的一点羞耻心,脱离了道德礼仪的羁绊,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要脸”了,竟释放了他的原始恶和放纵。

当认为是田小娥的魂灵给白鹿原带来瘟疫时,众人提议给田小娥塑像修庙。白嘉轩提议到祠堂去讨论,不断断然拒绝修庙,而且义正词严地提出修六棱塔镇压田小娥魂灵,不得再祸害白鹿原生灵,以维护整个宗族的荣誉和生命延续。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白鹿原传统礼仪文化开始走向式微。一方面缘于外部势力的冲击,使得礼法文化的威力和约束力的局限性凸显了出来。外地饥民的流入,本地人员的外流,黑娃土匪的助推,使得乡绅无力用传统礼法担负起维护宗族的重任。另一方面对应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未清到民国时期的公权力在乡村的延伸,由乡村自治发展到乡村官治,《白鹿原》中设立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仓官员叫总乡约,保障所官员叫乡约。乡约由教化而成为组织,鹿子霖任第一



《白鹿原》小说封面



《白鹿原》2017年版电视剧剧照



保障所乡约,成了“官人”。后来白鹿原改为联保所,鹿子霖又任联保所下辖保公所保长。乡绅纳入官僚轨道,良莠不齐,土劣化、功利性明显,白鹿原在各方逐力下改变了原来的稳定性,形成平行四边形的发展合力。

依靠白孝文在县保安团的权势,白嘉轩在族人面前以至上原上都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免征壮丁。然而白嘉轩感受到的不是荣耀,而是乡约的无奈,于是在家未逃的族人召集到祠堂里,布告大家:“除了大年初一敬奉祖宗之外,任啥事都甭寻孝武也甭寻我了。道理不必解说,目下这兵荒马乱的事我无力回天……”

繁华落尽,家族礼法治理模式走了下神坛,留下了那黄土高坡悠长的秦腔秦韵。

2. 有人说“上帝创造了乡村,人创造了城市”。费孝通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对西洋社会和乡土社会的“两种格局”、人治和法治、无讼和有为政治进行了分析,这种分析与陈忠实描写的《白鹿原》时代两相契合,可以诠释《白鹿原》的礼法治理模式的适当性和局限性。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西洋社会是团体格局,如同一捆捆的柴,即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团体。中国乡土社会是差序格局,如同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

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这两种格局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团体格局中的道德观念强调人人平等、权利义务。差序格局中的道德观念要求从己出发,提倡“克己复礼”“修身为本”,推己及人,自己与亲属的道德联系是孝悌,自己与朋友的道德联系是忠信。

白嘉轩在作品中成为儒家人格的化身,他严格按照伦理道德修身齐家,守孝道,恪守“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白家形成了严格的封建家庭伦理秩序。他又将家庭伦理推及社会,广施仁义。鹿三作为他家的长工,吃饭同堂,情同手足,他们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白鹿村“仁义的典范”。朱先生是理学的传人,承继宋明理学的道德实践,维护儒学的自省精神和“内圣”原则,“学为好人”是其一生名言,俨然成为白鹿原的精神领袖,这是乡土中国差异格局的必然要求。

《乡土中国》指出,如果由此得出西洋是法治社会、乡土中国是人治社会这样对称的结论,是“很不清楚”的。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由此看来,白鹿原乡土社会没有“法”,却有“礼治”,它正是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相互适应,通过“不断重叠、蛛网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到其他人,进而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合适的统治秩序。当白鹿原外的风云变幻波及原上时,原上的兄弟相煎、残酷报复,展现了封建礼法走向现代法律的交缠。乡约松弛,礼治废弃,出现了时代转型的阵痛撕裂甚至流血悲剧。这种悲剧宣告小农经济与小农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崩塌瓦解,昭告传统礼法治理下抹杀人性的历史局限性。

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最理想的维持秩序的手段是教化而非打官司,如同“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所吹的哨”一样。正如思想家顾炎武所说:“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辅人君之治,罔假兼于庶狱,而民自不犯于有司”“宗法立而刑清”。然而现代社会的目的并非教化,而是厘定和保护权利。在乡土社会向现代大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当时的司法制度在乡间产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却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法治秩序。

在《白鹿原》的礼治社会,儒家文化是乡村治理的灵魂,《乡约》是内心道德的外化规范,祠堂是宗族凝聚人心的精神家园。朱先生、白嘉轩代表的乡贤治理,白鹿精灵是大同社会的精神寄托。这种桃花源式的治理方式,正是自秦汉以来延续了2000余年的“县政自治”模式和依靠传统礼法道德的无讼追求。小说中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最好的注解:白嘉轩与鹿子霖因为李寡妇一地向两而剑拔弩张,经过朱先生的从中调义,两人各退一步,重归于好,没有走到县衙就解决了,为白鹿原赢得了“仁义白鹿村”石碑。

《白鹿原》阐释的礼治社会和法治社会的相互融合、保护权利和天下无讼的相互协调的辩证思维,对现代乡

“爱”的是是非非

汪宇堂



电影《涉过愤怒的海》海报

仿佛喝了一杯烈酒。但看到最后,观众才发现被“涮”了——电影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复仇爽片,而是无比深沉的紧张感。它就像套了“尽管过火”的壳,既讲了一个《狗十三》的“中国式”亲情故事——电影的烈度之猛、愤怒之浓,可能是国产院线电影少有;也让银幕之外的观影情绪,全程处于一种屏息凝气、心惊胆战的激烈状态,

其是黄渤和周迅角色的对峙,一个替女惩仇,一个护子心切,两人原本没有任何冤仇,但现在只能斗个你死我活,比如老金一口气追回国内,强闯民宅,鱼雨拦截……

老金在完成自己心中一步步的计划,可那只是出于责任,强装悲伤。为对应片名里的“愤怒”,整部电影在讲述“愤怒的海”中隐藏着的一对离异家庭背后是怎样的阴冷、裂变的故事。遗憾的是,老金直到大结局时才彻底幡然悔悟,可为时已晚,悲惨的内核已说够惨。

说完老金的“爱”,再说说娜娜的“爱”。她的爱很霸道,很自私,极具排他性。这与其从小父母离异后的生活高度相关。直到认识李苗苗,是娜娜在生日当天给自己的一次疯狂体验,在兼职的店里出去揽客,拽住了COS瓦尔奇奥拉的这个男人。起初只是点点心动,没想到对方竟然留意到自己的生日,并且下单了草莓蛋糕祝她快乐。向来缺爱的娜娜,一瞬间沦陷。所以,娜娜才在开篇躲在壁橱中念叨着自己喜欢草莓,因为那会令她想起李苗苗炙热的爱——炙热到嫉妒之心令她面目全非,这是一种极其畸形的爱。

娜娜和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的女主松子一样都是爱缺失,

也是爱无能。让她们所托非人、偏执求乞甚至失去自我,每建立一段关系,依附关系远远大于爱。爱不是第一位,她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所以极度痛苦,逼迫她们最终自己去伤害自己。

李苗苗是逃跑了,17刀没有一刀是致命伤,娜娜没有报警求救,也找不到任何人去求救,她躲进了壁橱,囚禁着自己,在黑暗的空间里用血手画着太阳花渴望那个太阳。父爱如山不如壁橱一隅,在她的世界里,没有自杀,全部都是他杀,精神上的他杀。她全然不懂的是,孤独和自卑催生出的李苗苗骨子里的暴戾和冷酷,让他对自己憎恨的人和事,通常喜欢以摧毁的方式来解决。

家庭教育并非易事,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需要学会尊重、理解和支持。《怒海》中的母亲景岚虽然愤怒、失控,但她的心深处,对孩子的爱是真挚的。然而,她错误地将爱理解为控制,拿她的话说就是:“他就是恶魔,也是我的恶魔。”打着“我都是为你好”的旗号,她以自己的方式为孩子规划人生,以至于演变成了偏执型人格。随着儿子进入叛逆期,母亲也会逐渐失去情绪管理,变成过度“控制欲”;我才不管孩子变成什么,反正我都要将孩子送

到国外!

“这年头,开车要驾驶证,当老师要教师证,就连做学生都要学生证,可是当父母却不需要证书,孩子一出生就自动认证成功,升级上岗。”这句话在网络上被流传成了段子,或是用来自嘲做了父母还一窍不通的蒙圈状态,或是用来抱怨不负责任教子无方的家长。无论是戏谑还是抱怨,这句话都戳中了当下大多数父母面临养儿育儿的迷茫而不自知的真实状态。儿童教育家伊丽沙白·克里里在她的最后一部书后写道:“孩子需要的是不完美的父母,而是富有爱心、不断成长、持之以恒的父母。”在教育的过程中,是父母的价值观、学习能力,决定孩子的未来。没有谁强谁弱,谁大谁小,是父母和孩子拼命磨合,共同成长的意愿将这一份亲情烘烤得温馨而伟大。

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江淹在《空青赋》中说:“溺爱靡慈,魂飞心离。”很多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动因,正是来自溺爱。日本电影《告白》中的森口老师有个可爱的女儿,而几个月前她那四岁的女儿在泳池溺水身亡,警察给出的结果是意外,但只有森口知道这不是意外,并且她知道这是她班上的学生A和B所为。但是,未满14周岁的A和B犯案是不负刑事责任的。B的妈妈是个极度宠溺孩子的母亲,当她知道她的儿子杀了人之后,她却认为她的孩子都是因为帮朋友才会变成这样的,这并不是儿子的责任。这样的母亲投射到自己孩子身上的眼光,全都是宠溺,论是非黑白,是时候为溺爱画上休止符了。

村依法治理,无不启迪和警示作用。

3.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以年迈的巴黎清洁工让·沙梅从尘埃里淘金、最终积攒成一朵金蔷薇的故事,来隐喻文学创作的艰辛过程,形容作家们从粗粝的现实中间寻觅素材、呈现经典的创作本质:“每一个瞬间,每一个偶然投来的词语或眼神,每一个缜密的思想或一句戏言,每一个人类心灵的细微活动,以及杨树的飞翔,夜间映在水塘里的点点星光,这些同样都是金粉的碎屑。我们文学家在几十年里搜寻这无数的细沙,为自己悄悄把它们收集起来,熔成合金,然后铸成自己的‘金蔷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或长诗。”

《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用两年时间准备,然后从44岁写到50岁,查阅了西安附近三个县的县志,做了很多社会调查,翻阅了很多文史资料和地方史文献,重温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关于土地的兴衰史和发展史,“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始成《白鹿原》。他植根生活深处,紧扣时代脉搏,熟悉犁地、割麦、碾场、掰玉米等农活,他当过小学教师、公社干部,手中老茧,脸庞黑红,丹心朝阳。他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当写到田小娥被公爹一个校鞭打过来,田小娥扭头一声“大”,后背的血像泉水一样汩汩流出来时,陈忠实失魂落魄,泪流满面。他想起他翻遍蓝田县志20卷,足有四五卷记录的贞烈烈女;他想起徽州100多座贞节牌坊,每一座牌坊下的哀怨……他让这个曾经追求爱情与自由的女子残忍死去,是万分痛心不已,但又何尝不是希望那个时代死去。

当他划完全书最后一个标点,他两眼突然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不是狂欢,不是愉悦,是一种解脱和升华。陈忠实在一次采访中谈,书中人物的命运也会与自己情感交织在一起,作者会很容易和人融合在一块,面对生离死别,面对灾难磨难,都会产生情感上的影响和关联,但如果你真正开始写作,开始进入文学创作的世界,你就会被“魔鬼”缠身,一辈子摆脱不了。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或许正是因为“文学魔鬼”的折磨,这位“造迷官殿千门万户手、建楼台榭飞檐走兽匠”的陈忠实于2016年溘然去世,享年74岁。他为《白鹿原》而生,为《白鹿原》而死。窃以为,我们的检察文学和影视作品创作,也应该有这样的精神。

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快乐王子》中,因为王子的一滴眼泪留住了即将飞往温暖埃及的小燕子,这样的情感之魔非经典不能完全。看见《白鹿原》中展现的乡村治理的礼法文化宝石,见证礼法治理下的社会百态,不仅没有使《白鹿原》显得粗俗丑陋,更凸显了《白鹿原》厚重的历史价值,它是承载着民族民生、文化政治、历史生态的一道原。这道原,凝固着华夏社会3000年农耕文明在动力的挽歌式写照,是民族文化在社会激荡演进中的动影,是华夏民族深沉的人文伤逝,是历史洪流对传统文化的侵蚀和重塑。

世间已无白鹿原。历史之风拂过田野,融合“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定会呈现“天地人文,和而共治”的亮丽风景。